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陆贵山 周忠厚 编著

马克思主义 文艺论著选讲

(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第四版)

陆贵山 周忠厚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第四版) / 陆贵山, 周忠厚编著. 四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08080-2

- I. 马…
- II. ①陆… ②周…
- III. 马列著作研究-文艺理论-教材
- IV. A851.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3865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第四版)

陆贵山 周忠厚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民族印刷厂

版 次 1982年9月第1版

规 格 170 mm×228 mm 16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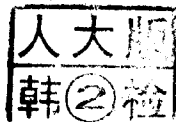
2007年7月第4版

印 张 32.25

印 次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814 000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此书荣获国家教委
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第四版序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方法

文学和文学理论是多样的、丰富多彩的，都有各自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不能搞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自身思想的先进性质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宏观视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观察和研究文学现象提供了科学的宏阔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时俱进、开放创新的思想体系，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探讨带有明显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为全面地完整地考察文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历史意识。“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人类的第一个历史的活动，“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2]。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

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3]，要真正地、实际地“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4]。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和意识形态形式都只有把它们置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历史环境里和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辩证思维。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是观察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的最灵验的钥匙。文学艺术的本质、功能、价值、意义和特殊的思维方式，作为相互关涉的系统结构都存在着辩证的联系。所有的理论和概念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5]。“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6]。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本质实际上都是一种发生着辩证联系的系统存在。一点论、片面性、走极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非此即彼，除此以外，全是鬼话”等线性的运思方式和文学研究过程中屡屡出现的回归现象、轮回现象、钟摆现象和所谓“瞎子摸象”、“坐井观天”、“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思维惰性，均属僵化的刻板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都可能成为妨碍人们全面认识和体验对象世界的理障。恩格斯这样告诫人们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7]。为了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对判定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的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思维误区，对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是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标签、套语和教义的教条主义哲学的思维惰性，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观点

关于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8]恩格斯认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

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9]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理解文学艺术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它的性质和功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飘浮在精神领域顶端的意识形态形式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形式相互影响，并通过一定的中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和现实生活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的关系一般表现为决定和被决定、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还表现为相互适应的关系。恩格斯在晚年特别重视精神、思想、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和交互作用，强调两者的“合力”关系。必须全面地、辩证地把握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之间的决定关系、适应关系和由于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关系”的复杂性及其表现形态。

关于文学是艺术掌握世界的“专有方式”的观点。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0]这里所说的“具体总体”、“直接的直观的表象”均指外部世界的感性存在。“思维总体”所体现的“思想具体”，实际上蕴含着掌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思维的理解”侧重体现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宗教精神”侧重体现人与世界的信仰关系；“实践精神”侧重体现人与世界的意志目的关系；而“艺术精神”则侧重体现人与世界的精神层面的感性的和“直观的表象”的关系。实质上，在体现人与世界的感性和表象关系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也必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抽象思维的作用、信仰、价值取向和达到行为目的的意志。这些因素总是这样那样地联系着，并通过实践协调互动。从思维上对世界的各种方式的掌握，首先是“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11]。这种思维中的动机、感觉、信仰、意志等等只有通过实践的物化过程，才能使对象变成“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2]，成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

关于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宗教……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3]“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14]，同样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所制约。文学作为语言中的精神生产，既有作为精神生

产的特殊性，又有作为一般生产的普遍性，表现为两者的辩证统一。“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经历着“生产者物化”和“所创造的物人化”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16]审美主客体交互作用，双向生成。“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对象生产主体。”^[16]“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7]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中，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属于语言艺术的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是通过文学语言的创造来实现的。精神生产虽然受制于物质生产，但与物质生产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两者宏观上是平衡的，微观上是不平衡的。而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如经济落后的19世纪的德国，文学艺术可以表演第一把小提琴。古希腊神话具有恒久的意义和价值，以不可超越的艺术魅力，成为不可企及的范本。

关于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观点。马克思把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区别开来。他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生产，不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会不同程度地根据“物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不管对两个尺度作何种解释，审美实践的感性的创造活动，都只能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交互作用。因为无客体的主体和无主体的客体的审美实践的感性的创造活动都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进行的。

上述几种观点，都属于意识和精神范畴。关于意识形态形式的论述和关于通过思维艺术地掌握世界的论述属于反映论层面；关于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论述属于实践论层面；关于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论述属于创造论层面。诚然，实践活动和创造活动的动机和构思都必然依靠和伴随思维活动。因此，这几种观点实际上都认为意识和精神领域中的认知活动、实践活动和创造活动是相统一的过程。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和实践活动，都必须以对对象的把握为基础。任何一种意识生产和精神生产尽管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但都一定程度上受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的决定、影响和制约。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质，首先表现为感性和感性的整体性，即马克思所说的通过“直接的直观的表象”呈现出来的“具体总体”。受历史唯物主义普遍规律支配的意识和精神生产，都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有思维指向和预期目的的“感性活动”。应当把感性对象，从主体的能动方面理解为实践的批判的感性活动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所面对的全部“感性世界”不是“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9]。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但并没有明确指出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审美往往

被界定为感性学，强调审美经验的个体性，一般不表现为纯粹的思维理性，并不承载强烈的功利性和政治倾向性；而意识形态则大不相同，它往往是群体、阶级、集团和国家的意志的集中体现，以思想体系和系统观念形态出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政治倾向性。不管是虚假的意识形态，还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意识形态都是如此。

可以从“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感性实践中引申出审美意识的概念。审美创造活动是实现审美意识的实践活动，而文学艺术作品实际上是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审美意识只是一种形态，只是一种“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0]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不能直接等同于具有思想体系含义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可以划分为感性形态和理性形态；审美意识一般呈现为感性形态。但也不应该把审美意识完全视为非理性的。美学的原意虽然被界定为感性学，但它追求感性的完善。审美的感性形态不是纯感性的。这种感性积淀着、贮存着理性，审美的实践创造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往往表现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1]。感觉蕴含着理性的基质，“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22]。因此，感性可以发展为、提升为理性范畴。只有发展和上升为理性范畴的审美意识，才能被称为审美意识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

恩格斯主张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来观察和评价作家和作品，并把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视为衡量作家和作品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23]。恩格斯这里所讲的虽然是文学批评的标准，但实际上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提出来的文学观念。因为批评是“运动着的美学”或“实践中的观念”。一定的批评模式总是折射、反射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观念。对文学怎么看，制约着、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对文学怎么评。反过来说，对文学怎么评，确证对文学怎么看。应当强调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观念、原则、方法和标准的互通性和一致性。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既是最高的原则、方法和标准，也是最高的观点。“美学观点”、“史学观点”以及“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辩证统一和完美融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恩格斯实际上是把文学本质视为审美本质和社会历史本质的辩证统一。文学既是社会历史现象，又是审美现象。这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带有审美属性的，或具有审美特质的；这种审美现象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特殊的构成部分，是富有社会历史内涵的。简言之，社会历史现象应当是审美的；审美现象应当是社会历史的。换言之，完全摆脱审美特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和完全剥离社会历史内容的审美现象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文学创作应当追求社会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的和谐统一。正如恩格斯所倡导的，文学创作要尽可能地实现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24]。这种要求作为一种艺术的理想和戏剧的未来，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内容因素和形式因素的有机统一。

历史是人的历史。从史学观点中，可以自然地引申出人学观点。这样，可以从美学观点、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的结合上，更加全面地完整地考察文学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最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

从美学观点看文学，可以彰显文学的审美的本质、功能、价值和意义，以弘扬文学的美学精神。审美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渗透着、蕴含着社会历史的、人文的，乃至自然的、文化的内容并通过这些相关因素表现出来。纯粹的审美主义和纯粹的形式主义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恩格斯从结构、情节、韵律、格言等方面，提出美学要求，主张有卓越的个性刻画，反对垂死的模仿文学的恶劣的个性化，认为作品应当更加莎士比亚化，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不要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从史学观点看文学，可以凸现文学的社会历史的本质、功能、价值和意义，以弘扬文学的历史精神，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观点、原则和方法考察和研究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契机，追寻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精神现象的“根源的根源”和“动力的动力”。恩格斯指出诗人歌德的出现和他的复杂的思想结构是由他所处的当时的德国的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列宁认为，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的矛盾是俄国的深层的社会矛盾在他的头脑中的投影和射光。任何人都难于摆脱鄙俗的充满历史惰性的社会环境对自身的濡染，即便是像歌德和黑格尔这样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也不例外，他们尽管“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25]。文学创作通过审美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应当反映社会生活的状态和风貌，包括真实表现一定的阶级关系和人物关系，正确表现历史结构、社会矛盾、社会运动以及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趋势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拉萨尔的剧作对济金根这个人物形象所围绕的历史状况、社会运动性质和阶级关系，作了完全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错误描写。《济金根》把悲剧的主人公这个本来是一个“在统一和自由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的“垂死阶级的代表”，描写为实现德国统一的民族英雄，冲淡和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市民阶级应有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积极的历史作用。

从人学观点看文学，可以突出强调文学的人文的本质、功能、价值和意义，以弘扬文学的人文精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6]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守和重塑当代的人文精神，对提高文学创作的人文品位、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价值取向

反映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称颂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伟大的历史转折，赞扬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创作和列宁对托尔斯泰

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法国和俄国从宗法制农村公社向市民社会转型的历史进步过程给予了极高评价。正是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反映了“翻了一个身”的那个时代的经济结构的更替、政治制度的改革、社会关系的转变、思想文化的更新等一系列的重大的社会事件和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市民社会取代封建宗法制社会的历史变革，一方面对妄图倒退到田园式农村公社的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潮进行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是我们所不取的”^[27]。马克思批评那些诅咒历史前进的人“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28]的“田园诗人”。他们反对“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的现实社会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29]。马克思、恩格斯厌恶把历史人性化、情感化和道德化的倾向，反对一些政治势力“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30]。他们对宗法制农村公社阻碍历史进步的负面作用具有清醒的理性认识，“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31]

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正如历史是人的历史一样，人也是历史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是紧密切相关的。把人的问题，置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加以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区别于其他人学理论的最大特点和优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重要的功能、价值和意义以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谋求全人类的解放为终极目标。同时又主张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解放理解为一种改变现实，同时在改变现实的过程中，改变自己，在创造环境的同时，完善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32]。他们指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33]。“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4]。马克思主义不仅把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更强调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充分肯定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人的社会实践才是改变自身的命运，求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改变人的异化状态，消除压抑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建构一个“以人为本”的公平合理的社会家园，都需要依靠伟大的社会实践来实现。这不仅是人的解放的正确道路，而且是创作的源

泉，同时也是文学艺术繁荣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只有通过实践改变违反人性的不合理的社会环境，才能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与历史发展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那些空谈人的解放的虚假的人学理论，诸如对抽象的人道主义、空洞的泛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社会主义”、审美乌托邦、语言革命、“词名革命”、道德说教、精神呼吁、舆论批判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并通过承接和改制，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同时从人学视阈，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

[注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8~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同上书，89页。
- [3] 同上书，92页。
- [4] 同上书，95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同上书，714页。
- [7] 同上书，300页。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9页。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32页。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47页。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2页。
-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9页。
- [16] 同上书，10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1页。
- [18] 同上书，46~47页。
- [19] 同上书，76页。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5页。
- [21] 同上书，96页。
- [22] 同上书，124页。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61页。
- [24] 同上书，557~558页。
- [25] 同上书，218~219页。
-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83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83页。

[31] 同上书，765页。

[32] 同上书，7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21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5页。

21

世纪

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第三版序

本书自1982年问世后，至今已有20多年了。这20多年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伴随着历史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坛进入了一个沸沸扬扬、纷纷扰扰的时期。特别是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20年，中国学术界几乎走过了西方文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路程。现当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批评模式、文艺观念、文艺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当代文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谓“祛魅化”运动的磨砺和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只能给科学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使之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事实表明，经历了新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偶然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身的学科特色和学理优势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和开放的多维视野。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中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真为基础，尽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对现实主义，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理解为

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有的理解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的理解为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各种艺术样式尽管互不相同，至少各有倚重，但任何风格、流派的创作和作品，即便是浪漫主义的、表现主义的、形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都必然这样那样地程度不同地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折射着一定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这使得各式各样的创作和作品都渗透着某种现实主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则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对不同形式的创作和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精神，采取教条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妥当的。

文艺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精神现象，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不仅需要从与人的历史和人的物质实践的总体联系上把握文艺的存在方式，而且还需要从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同其他相关的意识形态形式，诸如政治、文化、哲学、道德、法律、宗教的互动关系中，阐释文艺的性质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文艺的本质的理解不是单一的、直观的、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多维的、宏观的、立体的、开放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任何意识形态和精神现象，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往往使一些学者把对文艺的社会学和反映论的理解，当作带有母元性质的首要的、主要的、基本的原则。这种见解仍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的界定还有与此相关的一些不只是限于补充性的，而是带有开创性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说明。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把文艺阐释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精神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产物；是人对世界的一种有别于哲学抽象思维的、宗教幻想的和“实践—精神”的特殊的“掌握”方式；是实现人的精神需要的一种既是感性的又是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论述都为文艺理论家在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从事对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研究，从事对文艺的生产论研究，从事对文艺的实践论研究，从事对文艺的价值论研究，从事对文艺的人学和生命美学研究，开掘和拓展新的探索领域，通过重新阐释，提供丰富、深化对文艺的本质和功能的新的理解和新的理论建构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恩格斯是主张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来看待文艺的。恩格斯是从文艺批评的视角倡导一种包含着美学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的文艺观念的。恩格斯实际上是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审美本质与社会历史本质的辩证统一。以“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研究文艺的审美本质和文艺的社会历史本质都是需要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从史学观点必然引申出人学观点。这样，完全有理由把文艺的本质规定为文艺的审美本质、社会历史本质和人学本质的完美融合。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研究文艺的审美本质、人学本质和社会历史本质以及彼此之间的丰富复杂的相互关系，从宏观视阈研究文艺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各自内涵和多向互动，将会大大扩展和拓宽文艺学的理论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文艺的审美本质有不少精当的理论表述，而且他们承接、吸纳和弘扬了强大的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派的理论资

源，建构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框架的科学的社會历史学说，形成了至今仍然难以超越的理论优势。存在主义者萨特曾指责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是他发现了所谓“人学的飞地”。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学理论缺乏深入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辈的人学理论资源的发现、开掘与创新达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最高水平。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学理论相当丰富、完整和系统。他们对人学和文学的关系，发表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人，不是空想的或幻想的人即空想社会主义和审美乌托邦所想象和塑造出来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人。从人的群体性和人的个体性的关系看：马克思、恩格斯既倡导解放全人类，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和伟大的善；又主张个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这又是对个体的生命的理想生活状态的多么执著的追求和关爱。从人的客体性和人和主体性的关系看，马克思、恩格斯既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自觉地把人放到整个社会历史结构系统中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又强调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从而充分肯定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历史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恩格斯对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资本、权力、体制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压抑和迫害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充满深切的同情，发出愤怒的吼声，进行激烈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一系列政论和评论文章，对处于无权地位的普通人的非人的生活困境进行声讨和抗争。他们还鼓励作家表现贫苦人群的生活状态和命运。恩格斯曾把热心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困顿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等人誉为“时代的旗帜”。

总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个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包含着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机相连的，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从“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从“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论大异其趣；从“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把对文本的美学研究、人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了文艺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和谐统一。与此相联系，还尽可能地将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注意到，文艺研究经常出现一种类似“轮回”、“钟摆”那样的现象。当西方文论热衷于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论恰好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以至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当中国文论倾心于对文艺的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论又开

始突破文本主义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囿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外部规律的研究。中西文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错位。现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又紧跟着当代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艺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文艺的外部研究。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次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至于其他转向，多得难以描述。现当代西方文论总是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地变换着。后学们具有强烈的反超意识，总想压倒和取代他们的前辈。这个转向，那个转向，转得人晕头转向。当然，西方文论的不断突破和更新，尽管某一领域和层面可能被片面地发展了，但毕竟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体验，发现了许多新性质因素，为进一步整合和建构更加系统的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内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本主义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外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和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新入本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由于脱离文艺的外部规律，不同程度上躲避和逃逸历史或人文。某些历史主义文论，特别是某些科学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非人文化、非主体化的倾向。有的人本主义文论和新入本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又往往表现出非史化的倾向，即展示出自我化、主观化、内向化、本体化、非理化、幻想化，乃至虚无化的倾向。其实，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专攻文艺的内部研究，或与外部研究相比，侧重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或者专攻文艺的外部研究，或与内部研究相比，侧重对文艺进行外部规律研究都是需要的。应当深刻揭示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辩证关系，努力把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加有机的理论系统。

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都体现着和贯穿着对各种非人的和非史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批判。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充满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充满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家族》通过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进行评论，充满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原理和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戕害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充满对德国的虚假的和有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以纲领的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批判，如此等等。

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异化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对旧世界的革命批判，改变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旧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学术的自由民主发出了深情的呼唤。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不同的性质、作用和功能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认为舆论批判是必要的，但取代不了对现实的实践批